

中国当代社会热点问题大聚焦

当代中国 纪实文学百部



悲欢祖国卷

华夏出版社

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百部

(悲欢祖国卷：国殇)

周明 傅溪鹏 主编

华夏出版社

时代风云的画卷

周而复

我们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急剧变化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高速公路”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知识经济”、“数字地球”，创造新的辉煌；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层出不穷。

面对迅猛发展变革的现实，在作家面前展现一个眼花缭乱的
新世界，也为作家展开无限广阔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新天地。优秀的文学艺术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和人民需要优秀的文学艺术。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比较易于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时代风云。

为了展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为历史留下辉煌的足迹，长期从事报告文学事业的周明和傅溪鹏两位同志，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花费了许多精力，组织和编辑了这一部大型丛书，皇皇十大卷，四百余万言，蔚为大观，实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事业的重要收获，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部丛书洋溢着时代感，选择了许多重要题材，反映时代风云，歌颂风云人物。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提出宏伟目标，重点也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科教兴国关键是人才，也就是重视和培养知识分子。“短绠不可以汲

深,器小不可盛大,非其任也。”(《淮南子》)没有大量的适合的人才,科学技术现代化及其他三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也就不能“兴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社会人类的财富!

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长江上游等地,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增加,大量损失耕地,我国森林覆盖率已降到13%以下。今年长江流量低于1954年,而受灾面积和损失却超过1954年水灾,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人口问题是重要题材。50年代末期6亿人口,不过40年光景,中国人口增加一倍,现在已有12亿多。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敲响了警钟,我国人口承载量的生命线是16亿左右,绝对不能超过17亿。

威胁中国和世界的杀手,第一是心脏病,其次是癌症;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都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全国死于癌症的人数仅次于心脏病。

上述重大问题和题材在这套丛书里,都有许多精彩反映和描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创新。这批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以热情的笔触,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歌颂历史变革,反映时代风云。

丛书中所选作家的代表作,既写了事业和人物的成功与欢乐,也写了他们同各种阻力、困难和邪恶的斗争,反映人民喜中之忧和忧中之喜,从今天的现实看到明天的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目 录

国殇.....	霍 达(1)
三门李轶闻.....	乔 迈(69)
把爱长留在人间.....	焦祖尧(86)
人生断裂层.....	傅溪鹏(112)
“球籍”问题.....	凤 章(186)
中国 863	李鸣生(217)
走向伯尔尼.....	吴海民(259)
白雪覆盖的故事.....	张湘霖(335)
天使与弃婴.....	冷 梦(368)
后 记	(393)



霍 达 女，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理事。

迄今著有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 500 万字，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卫生题材文学题材文学一等奖，《小巷匹夫》获凤凰报告文学奖。作品有英、法、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译本及港、台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

曾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其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华古今女杰谱》、英国剑桥版《世界名人录》等大型辞书。

国 殇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九歌·国殇》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危险信号：新星早陨、栋梁先折、他们没有晚年。这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1987年2月10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一元复始，国泰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写着：

新星早陨……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陨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50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1962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 1929 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 10 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 40 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 10 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1977 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 40，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劫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1987 年，他刚刚过了 50 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叹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

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10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10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10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10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10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10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42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20元，

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7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1967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69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69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190元，那已是 he 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遨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路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屉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指导教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客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

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1978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5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窝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夜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1983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屉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1983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

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 125 个单位共 17 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 1100 人，知名科技人才 200 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 2100 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 7 人，主治医师 48 人，医师 66 人，医士 14 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 50 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1987 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尽心尽力地疼爱偏心这个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

到时间的可贵！躺到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25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体，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泣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吗？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1987年1月30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1978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但他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4月12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49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1987年11月17日，北京。

清晨7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呼吸的男人，大约50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面庞清瘦、苍白；头发乌黑，但稀薄，呈常见的偏分状；他的身旁歪倒着一辆旧自行车。

几位过路的人发现了他，惊骇万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服毒自杀的征候。路人不知所措：是该报案呢还是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人是否确已死亡，根据体温猜测他躺在这

里的时间不久，得赶快送往医院，争取救活他。他们拦住了一辆部队离休老干部的车，把他抬上去，火速开往离此地不远的空军学院医院。

没有救了！这个人已经双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应消失，心电图呈毫无波纹的直线……完了！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谢以铨，现年 53 岁。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到农大，并且报告了就近派出所。

民警赶来了。

农大的领导赶来了。八旬高龄的周明群教授也赶来了。见到突然作古的谢以铨，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前天深夜，周教授和他的老学生、老助手、老搭档谢以铨刚刚分手，才隔了一天，怎么就……怎么就……

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虫学专家周明群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结识在 1952 年，那一年，谢以铨只身远离家乡扬州来到京城，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在周明群门下登堂入室。那时候，他那单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还带着瘦西湖的柳岸柔风，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奇怪，觉得这个“秀才”来学农业好像并非出于自愿。他笑笑，以浓重的乡音说，他爱这一行。是的，他爱家乡那碧绿的山水，爱扬州城外那葱翠的田野，爱雨露滋润下盛开的灿烂花朵，爱祖国沃土中萌发的绿色生命。不久，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读中充分显露出来，周明群爱这个聪颖而勤奋的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子。频繁的接触中，他还发现，谢以铨做学问专而博，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广泛的乐趣，他爱摄影，集邮，集火花，爱搜罗工艺品，还有良好的烹饪技艺。他多才多艺而又性情随和，他研制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脱）浸种处理一次有效的措施，节省了过去用“六六六”处理土壤并在苗期多次打药的需要，减轻了农药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成效显著。

1983 年以后，他又参与主持并执行国家“六五”、“七五”科

技攻关项目“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专题。在冀南棉区基地，他深入生产，调查研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与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虫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研究了棉铃虫危害棉花的经济阈值和棉花品种对棉蚜、棉铃虫的抗性。该项综合防治措施经在邯郸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1986年荣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表彰奖，并荣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十一个春秋就这样送走了，谢以铨已经年过半百。虽然他还是那么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气却渐渐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风霜皴裂了他的手脚，他长期出没在农田，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望之下很难使人看出这是一位植保专家，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绰号：“老农”。中国，千百年的农业国，亿万人口什么最重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的农业又处于相当原始的落后状态，饥饿的土地需要科学，需要像谢以铨这样的“老农”。

粮食、棉花丰收了，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好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农”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呢？谢以铨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队那样为同胞们所瞩目，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国民们并不看重那关系到10亿人口肚子问题的农业，城里人谁愿意下乡种地呢？挚爱土地、挚爱生命的谢以铨却“铁心务农”，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几十年在棉田麦垅中奔走时还带着多少疾病：高血压、胃病、肾病、慢性气管炎和便血！他是农业害虫的克星，为了保护那些绿色的生命，布下天罗地网，法力无边，使害虫无处逃遁，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对危害自己肉体的“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尽管他有一位身为护士长的妻子。他太忙了！

1987年11月6日，谢以铨偕同周教授应邀前往桂林柑桔研究所讲学。机票是他亲自“跑”来的，临行前一天还在系里陪同日本朋友修理仪器，当晚又赶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顾着老师